

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朴真奭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朴 真 奭 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84年·沈阳

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

Zhongchao Jingji Wenhua Jiaoliushi Yanjiu

朴真奭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4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7

印数：1—2,2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金 扬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洪淳甲

统一书号：11090·127

定价：0.82元

前 言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是亲密的兄弟邻邦。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这种联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日益紧密，并不断地向着新的高度发展。

在中朝两国人民又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而并肩战斗的今天，回顾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历史，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本书是关于中朝两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史方面的论文汇编，共由十篇组成。内容主要有：自公元前的远古时期（包括原始社会）至公元十九世纪中叶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的交流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另在书后添加附录，即选编了有关这一方面的部分资料。

笔者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为加强中朝友谊做出贡献。由于水平所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录

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	
经济文化交流·····	1
一至七世纪中朝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	14
八至九世纪唐与新罗的贸易、人民往来	
和文化交流·····	32
十一至十二世纪宋与高丽的贸易往来·····	47
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	
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	59
从十五世纪朝鲜训民正音的创制看	
中朝文化交流·····	81
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清与李氏朝鲜的	
经济文化交流·····	96
我国造纸术的传入朝鲜和它的发展概况 ·····	114
中国火药技术的传入朝鲜和朝鲜人民	
反倭寇斗争的胜利 ·····	120
从古代印刷术的发展看中朝两国人民	
的文化交流 ·····	132
附录： 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资料选集·····	147

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自从公元前遥远的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开始两国人民已经结成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中也是罕见的。本文从三个方面叙述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情况。

一 原始社会时期中朝原始人类之间的接触和互相影响

中朝两国原始人类接触的开始，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已经过了几十万年的历史。其根据可例举如下：

第一，中国和朝鲜都已发现相当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当前，我国境内业已多处发现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如在云南省元谋地方发现约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化石；陕西省蓝田地方发现约六七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化石；北京西南

周口店发现约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化石等。此外，还更多地发现属于古人和新入阶段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过去在学术界普遍认为朝鲜半岛不存在旧石器时代，朝鲜历史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但据近一、二十年以来的朝鲜考古发掘的进展表明，朝鲜也曾存在旧石器时代。即在朝鲜半岛已经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遗物，例如，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遗址、平壤市力浦区大岬洞发现的“力浦人”、平安南道德川郡胜利山遗址中发现的“德川人”和“胜利山人”以及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的“屈浦文化”第一期层遗址等。朝鲜半岛南半部也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朝鲜史学界认为，1966年发现的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遗址，是至今在朝鲜半岛北半部发现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里虽还没有发现人骨化石，但朝鲜学术界根据这里出土的动物化石和石器的制造方法普遍认为：留下该遗址的居民属于猿人阶段的人，是刚摆脱猿猴的最初期的人类，距今约有四十万至六十万年前。力浦人是早期的古人，而德川人是比力浦人更晚时期生存的古人阶段的人类；胜利山人则处于新人的初期阶段。

上述情况，在客观上充分具备了中朝两国原始人之间接触的始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包括猿人阶段）的可能性。

第二，1978年12月，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裴文中老师曾发表《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的论文。裴老师运用有力的化石证据，指出日本旧石器时代文化（据裴老师说，日本旧石器时代相当于八万至三万年前时期）和我国的周口店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并又证明，

地质时代第四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同中国大陆是连接一起的，许多动物就是通过当时尚未变成海洋的黄海、东海以及朝鲜海峡等地区跑到了日本，这里也包括周口店动物群的一部分成员。这篇论文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有些人根据自己在日本参加考古发掘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发表谈话说：“日本旧石器文化的渊源是在中国，……我完全同意裴文中先生的见解。”

笔者认为，裴老师的论文不仅在阐明中日关系的渊源方面给予启发，而且对了解中朝关系的渊源方面也给予极大的启发和帮助。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和日本的原始人类已结成某些联系，那么，推想地处两者中间，山水相连的中朝原始人之间能有更密切的联系，则不无道理。

第三，我国另一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贾兰坡老师在1979年编写的一本书中，根据至今发现的古生物化石指出：“在北纬27度~41度、东经106度~124度范围内的地区，都遗留着他们（指北京猿人）的足迹”。他在举例说明“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人民公社瓦房生产大队鸽子洞发现石器”的事实后，介绍学术界的看法时说：“鸽子洞旧石器文化，在石器的制作技术，类型以及大小等方面都非常相似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和第十五地点的石器。因此在文化方面它与北京猿人文化有最密切的联系，是它的继续和发展”。从中可见，北京猿人文化与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证明北京猿人与朝鲜旧石器时代人类之间存有互相接触的可能性。因为朝鲜半岛与我国东北的距离特别临近，它们是直接山水相连的邻居。

第四，朝鲜史学界的某些学者到国外进行学术报告时指出：黑隅里遗址出土的“同尖头石器相近的石器，则出土于中国周口店遗址最古层的第一地点第十三层。”南朝鲜史学界有些人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北京猿人与朝鲜旧石器时代人类之间有联系，认为：地质时代“洪积世前期的第一冰河期”过去之后迎来了“第一间冰期，气候温暖的这个时期，如同北京（猿）人一样的直立猿人”搬迁到朝鲜半岛创造了公州“石壮里第一文化层”。又在分析石壮里遗址发现的人的头发时说：“通过分析阐明了它属于蒙古人种，因而得到我们祖先问题的重要资料”。

上述事实可以基本表明：中朝两国都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大约在五十万年左右以前，我国河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一些地区都居住着属于猿人阶段的最初人类。他们大致在同样的气候和周围环境中向自然界进行斗争，并在两者之间很可能开始接触，已结成一定的联系。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越来越扩大和发展。不过，目前我们对这方面知道的还不多。然而可信的是，这个问题将随着两国的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发展，经过两国出土物的比较研究而必定会进一步得到解决。

原始社会末期，中朝两国原始人之间的联系实已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考古发掘来看，在今天我国的山东、辽宁一带地方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一种大石块叠起的石棚，它是巨石文化的一种，是一种原始社会末期的坟墓。石棚在朝鲜半岛曾普遍存在过，尤其在半岛南部和西北部特别多，如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已经发现了数万个石棚，其

数量之多令人震惊。朝鲜的石棚，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一人多高的宽大板石竖立在两面或者三面、四面，上面覆盖宽大的岩石；另一种是用扁石在地下并砌成箱形或井形，上盖厚大岩石。石棚在形制上的这种差异，可反映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它的发展过程，也可以反映不同地区的特点。据史学界的一些人认为，我国山东半岛的石棚，在形制上多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石棚相一致，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石棚多与我国辽宁地区的石棚具有同样形式。此外，朝鲜咸镜北道雄基曾出土过丹涂彩色陶器，该道图们江流域地区也发现了不少黑色陶器。为此，朝鲜史学界某些人的意见是，这些陶器也许与我们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文化和它的末期的黑陶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今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均能较多地发现石棺墓、各种形态的青铜剑等原始社会末期的遗址和遗物，它们之间存在着浓厚的共同特点。我国古代的商族有卵生的传说，而朝鲜古代的高句丽、新罗、伽倻等也都有卵生的传说。

这一系列事实可以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尤其从它的末期以来，中朝两国的原始人之间已经发生了较为广泛的联系，形成了密切相关的文化。

二 公元前中朝两国人民的经济交流

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朝鲜”这个名称已经传到中国来；它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进行了贸易。当时齐国通过海路从朝鲜输入了“文皮”（虎皮）、“毳服”（内外都

用毛皮制作的衣服的一种)等各种特产。

这些物品,尤其是朝鲜的“文皮”,在我国引起很大的重视。我国的《管子》等书,一再提到它的名字。而齐国的“斥山”(山东省荣成县海岸),以朝鲜“文皮”的集散地而知名,因此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这句话。《管子》记载:“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笑,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礪砥一笑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笑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笑也,汝汉水之右珣黄金一笑也,江阳之珠一笑也,秦明山之会青一笑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笑也”。可见,朝鲜的“文皮”在齐国被认为是“海内玉币七笑”中的“一笑”。这表明当时齐国和朝鲜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

战国时期,在今天的我国华北和辽宁等地区发展起来的燕国,与朝鲜的贸易往来也很活跃,它的贸易路线主要在陆路。燕国的明刀钱和各种金属工具大量流入朝鲜。今天朝鲜境内发现的明刀钱中的一部分,无疑是在这个时候通过贸易往来而传入朝鲜的。

公元前三世纪末以后,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起来。秦汉时期,我国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发展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对外关系也进一步活跃起来。另一方面,朝鲜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显著发展,公元前一千年纪中叶以后朝鲜南北先后都建立了国家,朝鲜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时期。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有了更大发展。

朝鲜各地丰富的鱼、盐、毛皮、枣栗等特产品引起汉朝

商人的重视，两国人民的贸易往来频繁起来。西汉政府也重视开拓通往朝鲜的通路。《史记》写道：“东绾涉、貊、朝鲜、真番之利”。尤其公元前128年，西汉王朝利用“涉君南闾”的归化机会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设置了沧海郡，结果带来了“燕齐之间，靡然发动”的现象。其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开拓通往朝鲜的商路。

公元前108年，西汉统治阶级以古朝鲜右渠王庶辰国（今朝鲜南部，下属马韩、辰韩、弁韩）与西汉王朝的联系为借口，派兵征服古朝鲜右渠政权，设置了乐浪郡等四郡，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所说的汉四郡。西汉统治阶级在四郡，与古朝鲜的原有贵族相结合剥削和压迫当地人民，朝鲜人民反对他们的斗争也日益发展。但是中朝两国人民之间却一直保持着友谊关系。中国的劳动人民为了谋生，陆续前往乐浪郡等地，同朝鲜人民进行贸易，交流文化，或定居在那里。《前汉书》写道：古朝鲜“都邑颇仿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公元前后，数以千计的辰国商人频繁地来往于乐浪郡进行大规模的贸易。这些事实多少反映了当时两国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情况。

当时我国不仅与朝鲜进行贸易，而且通过朝鲜与日本交往。据古文献记载，这时日本共有一百多个“小国”，其中三十多个“小国”已与我国建立了联系，这也许是在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的开端。在中日交往初期，朝鲜人起了一些媒介作用。除乐浪郡以外，位于今天朝鲜东南端的“拘邪韩国”（今朝鲜庆尚南道金海）也成为中、朝、日贸易往来的要路之一。从乐浪郡出发的我国船只，沿朝鲜西南海岸航行

后到达这里，再渡一个海就到达了日本，毫无疑问，回航时也经过此地。《三国志》写道：“国出铁、韩、涉、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这当然描写公元以后时期的情况。但考虑在文章中所描写的铁的普及程度，尤其在公元前后形成的金海贝冢中发现了铁器、铁块等情况，可以推测弁辰的铁不仅在公元后才成为国际商品，有可能在公元前就已经供给日本和乐浪郡等地。可见，这种铁曾通过“拘邪韩国”而输出各地。这样，早在二千多年前，朝鲜半岛东南端的“拘邪韩国”在加强中、朝、日三国的国际联系方面起了一些作用。

三 两国人民往来的迅速增加， 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贸易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有了增加，尤其是公元前三、二世纪以来的一段时期，中国的被压迫人民大量迁入朝鲜，同朝鲜人民一起生活，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历史友谊中值得注意的一页。

秦王朝时期，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而且越来越激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劳动人民并不甘心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甘忍受繁重的徭役负担。他们利用怠工、逃跑，直至武装起义等各种方法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在反对秦王朝统治阶级的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人后来到达了朝鲜南部。当时，朝鲜南部属于辰国。他们把这些人

安置在国家的“东界地”。这样，从中国去的被压迫人民就在朝鲜“安置”，与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下来，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辰韩”。这些人与当地人民长期友好相处，交流了经济和文化，并在几百年以后也仍然使用中国语言，如称“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因此有的便把“辰韩”叫做“秦韩”^①。

秦末西汉初，我国正处于大动乱的时期，当时住在今天我国的河北、山东等地的“燕”、“齐”、“赵”等人民，为了逃避赋役成群结队地逃难到古朝鲜，人数达“数万口”之多，古朝鲜把他们安置在国家的西部。西汉初，由于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燕人卫满带领千余人亡命到古朝鲜。古朝鲜准王任命他为“博士”，封给他西部地区百余里土地。后来，他推翻了准王政权，建立了卫满朝鲜。由于他采取了“诱民政策”，因而受压迫的我国劳动人民移往古朝鲜者日益增多；汉设四郡以后，我国有更多的各阶层人民迁入古朝鲜地区。这样，住在朝鲜的中国人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些移住民中，也有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人物，但绝大部分都是受压迫的、不得已而去的劳动人民。这些人当然受到当地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但他们与朝鲜人民一直保持着友谊，从初期的客居变成定居，逐步融合成当地人民。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朝鲜人民迁入中国。据《后汉书》记载。“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涉君南闾等畔（叛）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这就是一个证明。

^①见《后汉书》卷一百十五，东夷传第七十五，韩，辰韩。

上述一系列事实表明，中朝两国不仅是地理相连的友好邻邦，而且两国人民又是患难与共、血肉相关、具有悠久友谊传统的亲密兄弟。

两国贸易关系的继续发展，人民往来的迅速增加，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今天朝鲜境内已发现了大量的明刀钱和安阳布钱等我国战国时期的货币和各种金属工具。例如，朝鲜慈江道渭原郡龙渊洞曾出土了大约四百枚的明刀钱，同时和它一起出土了铜镞、铜带钩、铁镞、铁刀、铁枪、铁斧、铁锹、铁镰、铁制半月刀等金属工具；同道江界郡前川面仲岩洞出土了大约二百五十枚的明刀钱；同郡化京面吉多洞出土了大约四千枚的明刀钱；平安南道宁远郡温和面温阳里也出土了明刀钱和布钱；此外朝鲜西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在朝鲜南部也都发现了明刀钱。这些遗物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在我国战国时期以来的两国的贸易来往中传入朝鲜的；而另一部分，是在战国末期秦统一六国的封建兼并战争和秦末汉初的大动乱过程中迁入朝鲜的燕国等人带去的。

中国金属制品的传入朝鲜，能交流两国人民之间的生产经验，促进了朝鲜金属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增强了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属器中铸有不少汉字。据调查，朝鲜西北部六个地方出土的明刀钱铸有的汉字竟达三千多个，种类也不少，兹介绍其情况见11页表。

象下列统计表所表明的那样，可看到“左”、“右”、“行”、“コ”、“匕〔化〕”等字样，但我们无法知道统计表中表示不明的字里有多少种类的字。各种布钱中也铸有一些汉字。

明刀钱文铭情况统计表 ①

出土地点	出土数量	文铭及其数量						
		左	右	行	正	匕〔化〕	不明	计
渭原郡龙渊洞	约400	23	26	7	45		68	169
江界郡仲岩洞	约250	27	17	4	11		56	115
江界郡吉多洞	约4000	312	307	236	312		1535	2702
昌城郡梨川洞	20	2	7				3	12
宁边郡都官洞	约 20	3	3	2	2		9	19
宁远郡温阳里	4(不包括破片)			2		1	1	4
共计	约4694	367	360	251	370	1	1672	3021

此外，大同江流域平壤附近曾发现以秦篆体铸有二十多个汉字的我国秦王朝时期所铸造的铁戈（秦戈），还发现了公元前41年西汉元帝时期铸造的“汉孝文庙铜钟”，这里也铸有“孝文庙铜钟容十升重卅十斤永光三年六月造”等字样。

至于“秦戈”和“铜钟”等文物传入朝鲜的年代，当然不好断定，因为文物的铸造年代并不等于传入朝鲜的年代。而平壤附近出土的汉代文物大部分属于公元以后时期，但是我们与朝鲜西北部发现的明刀钱等文物联系起来看，不能说它们传入朝鲜的年代一定在公元以后，也可能在公元以前就已传入朝鲜。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汉字同各种金属器具一起，早在二千几百年以前已经传入朝鲜。而朝鲜人民也可能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根据可有如下几条。

第一，《共产党宣言》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

① 《朝鲜考古学研究》第196~236页。

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加注时说：“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明显，恩格斯把文字记载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

据今了解，古朝鲜在公元前一千年纪中叶已经建立了国家，社会便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时期。这就使我们知道朝鲜人民已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接触了汉字。因此，他们接触汉字的时候，在主观上已经具备了使用汉字的可能性。

第二，公元前三世纪末古朝鲜准王任命卫满为“博士”，以掌管文化。当时，古朝鲜对天文、历学等科学技术进行专门研究，充分说明古朝鲜时期的文化、科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朝鲜人“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创造了诗歌《箜篌引》，其内容有：“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或淹）河而死，当奈公何。”朝鲜史学界有些人认为，这首诗歌可能在我们中国秦末汉初写成，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古朝鲜人民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品。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这首诗歌是否最初用汉字写成，或后来译成汉文，但是当我们考虑古朝鲜早已进入阶级社会，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也相当发展的情况时，究竟不能忽略这首诗歌的存在，它也许可以证明古朝鲜人民已经使用了文字（汉字）。

第三，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在其“国初”（《三国史记》的编者把高句丽的建国定为公元前37年）已经编写了史书《留记》一百卷。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不少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书经。可见，公元前后时期汉文化在朝鲜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发展，这绝不能一时而成，而需要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因此，这可成为古朝鲜人民